

西方语言学丛书 14

Western Studies in Linguistics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Bernard Comri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4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美]柯姆里著. —影印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西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301-14615-6

I. 语… II. 柯… III. 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3230 号

©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8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Reprint from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2ed Edition) by Bernard Comrie.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书 名: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

著作责任者: [美] Bernard Comrie 著

责任编辑: 旷书文

标准书号: ISBN 978 7-301-14615 6/H • 21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hanekuang@126.com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327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导 读

陆丙甫（南昌大学）

概 述

本书是当代语言类型学中第一本综合性的导论著作，至今还被广泛用作该学科的教科书，对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者 Comrie 在此书初版同年(1981)出版的 *Tense* 和之前(1976)出版的 *Aspect* 两书，是剑桥语言学教材系列中的类型学教科书，1977 年与 Norval Smith 合作发表了 *Lingua Descriptive Series: Questionnaire* (语言调查问卷)，这些也都对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30 年来，作者作为杂志编辑，丛书编辑组织者等，为当代语言类型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专著有 10 本(包括合作的)，独立编纂或合作编纂的专题文集有 16 套，论文 300 多篇，评论近 300 篇。最近的一本由作者促成并参与编写的文献是 2005 年出版的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该书就 142 个语言参项对世界语言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反映了类型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是语言类型学基本建设的一项里程碑工程；并且，由于该书全书内容以超文本形式上传网络(<http://wals.info>)，查阅极为便捷，为各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Comrie 还是国际语言类型学学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总之，Comrie 教授是继 Greenberg 之后在当代语言类型学中影响最大的学者。

本书区别于一般导论性教科书的特点是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对某些有趣的论题作较为深入的探讨，因此可读性比较强，并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实质性的分析和研究思路。此外，由于本书例子丰富，也可以大大开阔我国读者对语言多样性认识的视野。

从书名就可看出，本书强调语言共性，具体地说，就是从语言共性角度去分析语言类型。强调共性发掘，本身是当代语言学的共同点。当代语言学的两大流派，功能学派和形式学派，都极其重视共性研究。

当代语言类型学是各功能学派中最有系统性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事

实上,当代语言学中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的差别主要就体现在生成语法和类型学的对立上。Newmeyer 的一系列关于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之间异同的论著(如 Newmeyer 2005),主要是以当代语言类型学和生成语法分别作为功能学派和形式学派的代表来讨论的。因此,对当代语言学的方法流派感兴趣的人,不能不对类型学有个基本的了解。

值得思考的是,从“类型学”这个名称来看,好像是重在形式分类,跟共性和功能并无直接联系。笔者以为,赋予当代语言类型学以功能学派特点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分类是以普遍的功能参项为导向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共同的表达功能为参项对语言形式进行分类,也就是去描写同样的交际功能,不同语言是如何用不同的形式去“编码”表达的。如作者 *Tense* 和 *Aspect* 两本书,就分别讨论“时制”和动词“体貌”这两个功能概念,在各种语言中是如何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即如何落实为不同编码的。这一分类标准赋予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突出共性和功能的明显特点。不妨跟传统语言类型学作一比较。传统语言类型学以形态为主要基本分类标准,根据形态的多寡和有无把人类语言分成多综语、屈折语、黏着语和孤立语等。由于有的语言有形态,有的语言没有形态(或说几乎没有形态,这跟对形态的定义有关),它所根据的分类标准并非语言共性。当代语言类型学发轫于语序分析和分类,语序研究至今仍然是其最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而语序现象显而易见是所有语言都有的共性现象,这是由自然语言的本质和定义所决定的。并且语序的分类实际上也是功能分类,例如关于 S、O、V 三个成分的语序分类,实际上就是讨论由一个施事、受事和及物动词组成的命题,有多少编码形式的问题,即一个同样的表达功能有多少形式的问题。

其次,更重要的,是当代语言类型学以“蕴涵关系”为最基本的描写手段,而蕴涵共性和功能解释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蕴涵关系跟标记理论密切相关,而标记理论有着直接的经济性功能动因(常用的无标记形式采用简短形式)。不仅如此,蕴涵关系还反映了更多方面的功能优劣: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功能上(需要的程度、自然程度和处理的方便程度等)劣势的形式存在蕴涵着功能上优势的形式上也存在。以书中 1.1.2 节提到的“如果一种语言有第一/第二人称反身代词,那么该语言就有第三人称反身代词”,这显然是因为第三人称反身代词比起第一、二人称反身代词更需要。第三人称反身代词是避免歧义所必须的(“他骂他”不等于“他骂他自己”),而第一、二人称反身代词仅仅起强调作用(“我骂我”等于“我骂我自己”)。又如类型学中一条著

名的蕴涵共性是,“名词宾语前置于动词蕴含着代词宾语也前置”。这可以从信息流方向的自然程度来解释:代词比起一般名词,通常代表更旧的信息而有更大的前置倾向;连前置倾向较小的名词都前置了,前置倾向较大的代词也前置就是自然的情况。这条共性所排除的情况(名词宾语前置而代词宾语反而后置)则很不自然。上述关于人称代词反身形式的蕴涵共性,跟标记理论还可以扯上点关系(相对于第一、二人称反身形式,第三人称反身形式是无标记的),但是关于代词和名词不同的前置倾向,传统的标记理论很难概括。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蕴涵共性的描写本身是非常形式化的,逻辑上总能落实为“四缺一”的格局。但其背后的机制却是功能主义倾向很强的。蕴涵共性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形式描写,功能解释”的路子。

一门学科的基本方法往往决定了该学科的面貌。正如俗语所说,“把问题讲清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所谓“讲清楚”,就是描写清楚。描写清楚才能凸显本质联系。事实上,当代语言类型学跟生成语法的重要差别之一,是描写的内容大相径庭。

许多人以为这两个语言学流派的重要差别之一是“广种薄收”(广泛分析大量语言)和“精耕细作”(深入分析个别语言)。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生成语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广泛语言的分析。不过,语言类型学对广泛语料的重视,的确也导致了语言学研究之外的一个积极后果——语言类型学家在濒危语言的描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丰硕的结果,为人类文化遗产多样性的保存,做出了很大贡献。

此外,两个流派间另一些重要差别是对“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的偏重(1.3.2),以及分析的抽象程度(1.1.3)。

具体章节介绍

综观全书,大致可分成三大板块。前面三编构成第一块,是导言性的。第一编跟形式学派做对比,第二编通过跟传统的形态类型学作比较的同时,对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基本内容做了简单介绍;都带有学科定位的导论性质。第三编则是过渡性的,介绍了类型学所必须的一些基本概念。第四到九编为第二块,是具体课题的实质性讨论。第十、十一两编是最后一块,为引申和结语。其中第十编讨论当代语言类型学本体跟历史语言学和区域类型学的关系,第十一编是简要的总结和展望。下面我们逐一简介或评注各编内容。

第一编是学派和方法论的背景介绍。在讨论类型学方法特点的时候,主要与生成语法作对比对象。

其中对共性的三对分类中,最重要的是蕴涵共性和非蕴涵共性。蕴涵共性体现了当代语言学的方法论特点,它强调了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蕴涵共性和非蕴涵共性的差别也是三对之中最明确的。至于形式共性和实质共性的区别,绝对共性和相对共性(倾向性)的区别,都是比较相对的。关于“实质共性”和“形式共性”的区分,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不得要领。这一点跟翻译的局限性有关。根据原著的说明,所谓“实质共性”和“形式共性”,按照汉语的情况,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共性范畴”和“共性规律”。前者告诉我们,哪些范畴是所有语言必须具备的,后者告诉我们,哪些规则是所有语言都必须遵守的。绝对共性可以说是理想化的倾向,而倾向性可以说是绝对共性受到其他因素干扰的结果。因此,三对共性中,读者最需要把握的是蕴涵共性这一对。

这一编的另一个重点是 1.3.2 节的“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前者是从天赋能力去解释语言现象,后者则从功能上进行解释。若用物种演变为例,内部解释就是认为演变原因是生命体内部的基因变异,强调的是内因;而外部解释强调“自然选择”,即功能上适应性强的变异被保存了,功能上适应性差的就被淘汰了,所强调的是外因。现象的发生总是内、外因互动的结果,内因决定了形式表现的可能范围,而最终的落实的具体形式则取决于外因。因此两者都是必需的,不过是解释的角度和层次不同而已。在语言学上,形式语言学派强调的内部解释是要从大脑中的语言机制去解释语言。作者认为,在当时的研究阶段,内部解释的天赋说还没有经受独立的证据的检验,这主要指缺乏神经科学的证据。当然,如今的神经和基因研究已经知道某些大脑部位和某些基因的确跟语言能力有关,但距离了解大脑部位中或基因中哪种结构跟哪些具体语言规则有关,则还遥远得很。并且,这方面的实际进展主要是靠神经生理学者去推动的。

第二编介绍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大致内容。其中 2.1 章分析了类型分类跟共性发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宗”即为共性。也就是说,变化总受到一些共同的限制,而共同的限制就是语言的共性表现。2.2 章讨论如何选择那些能告诉我们更多有关语言其他性质的重要参项。虽然作者认为根据形态类型能够推测出的语言的其他性质很少,即形态类型跟语言的其他性质相关性不大,但在 2.3 章还是对传统的形态类型学做了一个简单总结。由于国内一般语言学概论对形态的介绍并不到位,这个简单总

结对于我国的读者仍然是个必要的补课。2.4 章稍微介绍了本书所强调的一些重要参项之外的有意义的参项,如核心和从属语之间关系是通过“附核标志”(head-marking)还是“附从标志”(dependent-marking)来表示这一参项,前者如主谓关系由动词跟主语的一致来表达,后者如动宾关系由宾语上的宾格来表达。不过附核标志和附从标志的分工并非总是这样的。我们熟悉的领属关系标志通常加在领属语上,如“领格”,是附从标志。但也有语言是采用附核标志的,如 2.4 章中例(1)提到匈牙利语的例子:

az ember ház-a (1)

这 男人 房子-他的 (这个男人的房子)

这种情况在我国民族语言中也很多,如鄂伦春语的例子:

ʃingj utə-j

你 儿子-你的 (你的儿子)

其实,古汉语的“之”,基本上是个前置性的修饰标志,因此“此男 | 之屋”和“汝 | 之子”中的“之”实际上是附在核心“屋”、“子”上的“附核标志”。跟上述附核标志例子的差别在于“之”是前置性的而不是后置性的。

在近年来的文献中,附核标志和附从标志常被分别称为“标引”(index)和“标杆”(flag),使用上比较方便。

第三编介绍了类型学所必须的一些基本概念。前面三章分别讨论了语义关系、语用关系和语法关系,也就是介绍了三个平面的问题。虽然我国读者很多人熟悉三个平面的区分,但本书的介绍仍然极富启发性。国内讨论三个平面着重于区分,而比较忽视三个平面的关系的本质。本书则强调三个平面之间的互动。作者认为“句法有许多部分只能结合语义学和语用学才能理解,更具体地说,只有结合语义角色和语用角色才能全面了解各种语法关系”。而他对主语的“典型的主语是施事和话题的重合”(见 5.2 章)这一定义,就是对上面观点的直接应用。这跟生成语法的强调“句法自主”观念大相径庭,跟国内以句法为中枢的三个平面也很不相同。3.4 章指出了形态格跟句法结构的复杂关系。3.5 章强调了不同语言对三个平面的运用程度可能不同。作者指出语法关系在英语里的独立程度高于俄语,而俄语中语义和语用角色所起的作用比英语大。这反映了三个平面的互动问题。这一章的意义还在于再次具体显示了“语法”不是自主独立的。

第四编“语序”介绍,分析和评价了 Greenberg 的语序类型研究。Greenberg 的语序研究开创了当代语言类型学,语序类型学至今仍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其中 4.2.3 节指出的 Greenberg 语序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很值得重视,如何加以改进可作为今后研究的目标。该节指出 Greenberg 的许多语序共性实际上是倾向性,同时认为满足于说成倾向虽然是由于材料所限而不得已,但是也带来一种危险,即不再继续探寻进一步的绝对共性或其他更强的共性。这对于我们如何提升理论研究是富有启发的。实际上,如果把绝对共性看做排除了干扰因素的理想化的倾向,那么,排除干扰因素而提炼出理想化的抽象的绝对共性原则,这正是理论研究所追求的目标。

第五编“主语”,对有关“主语”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我国语言学界的主语问题讨论,有直接的启示。以往不少人认为汉语因为缺乏形态所以才会有主语无法判断的情况,其实,同样的问题在其他语言中也广泛存在。第 5.1 章“问题”中提到,以大家最熟悉的外语英语来说,虽然根据动词跟主语数一致这一形态来说,存现句 *There are unicorns in the garden* 和 *There is a unicorn in the garden* 中的主语是 *unicorn(s)*,但是根据宾语从句中的主语可以提升为主句动词宾语这一转换标准来看,*there* 应该是主语。主语提升可以用 *I believe that Max is an accountant* 转换成 *I believe Max to be an accountant* 为例。同样,上述关于 *unicorn(s)* 的例子也可以转换成 *I believe there to be a unicorn/unicorns in the garden* (105—106 页)。书中提到上述存现句中动词跟后置主语的一致,“至少就标准英语而言”是这样的。这就隐含着非标准英语不一定如此。事实上,英语口语中存现句的动词常常通用 *is*,不管“后置主语”是单数还是多数。另外,对于重视语序研究的我国语法学界,我们还可以补充指出,英语中构成是非疑问句的“主语-动词”颠倒转换,也同样证明了 *there* 具有极大主语性。存现句的是非疑问性质是 *Is/Are there a unicorn/unicorns in the garden*。接下来后面三章还提到了不少有关主语难以确定的富有启发的有趣现象。顺便提一下,类型学中近年来的倾向是把及物动词所带的施事性较强的和较弱的两个论元分别看做主语和宾语 (Dryer 2005),也就是更倾向于语义标准。

5.2 章“定义和范畴”认为“主语”是个原型范畴,其典型成员具有施事和话题的两重性。作者认为其他语法范畴也可以这样处理,并举了俄语中的数词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名词性和形容词性:最小的单纯数词 *odin*“一”完全采用形容词形态,最大的单纯数词 *million*“百万”完全是名词,介于中间的那些单纯

数词都有形容词、名词的双重性,数目越大名词性特征越多。主语的双重性使我们想起吕叔湘(1979:45)所提出的一个比喻:“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之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个。好比一个委员会里几个委员各有职务,开会的时候可以轮流当主席,不过当主席的次数有人多有人少,有人老轮不上罢了。可以说,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吕叔湘这里说的“宾语”,相当于“论元”,可比做委员,而“主席”可比做“话题”。问题是汉语中“话题”本身已经是个常用的成分,而且汉语的主语和话题还不像日语中那样有明确的形态标志。从这一点来看,汉语中的“主语”判断问题的确比许多语言更复杂,特别是其跟话题的区别。也许我们可以套用吕叔湘的比喻说:汉语中主语是“常任主席”,而话题是开会时的临时“执行主席”,如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就由委员中的经济学家临时担任执行主席。

第六编分析格标志的分布规律。6.1 章讨论形态格在及物动词施事 A、受事 P 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 S 三者中的分配。由于一个动词不可能同时带这三个成分,从经济角度出发没有必要用三个形态格。如果要使其中两个成分共享一个形态标志,有两种方式:S 跟 A 合并成“主格”(nominative case),P 独用一个“受格”(accusative case);或者 S 跟 P 合并成“通格”(absolutive case),A 独用一个“施格”(ergative case)。这种若干表达功能共享某些标志的现象,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称为“匹配”(alignment)。Alignment 来自动词 align,本意有“对齐”的意思,也就是哪个功能跟哪个功能对齐而合用一个标志的问题。合用主要是出于经济性的需要。合用的一个原理是“标志的功能连续性”。如上述三个成分的分配体现了“及物性强度连续统”上的连续性。

(1) 施事性强弱的连续统(从左到右施事性越来越弱)

及物动词的施事	不及物动词的动作者	及物动词的受事
A	S	P
受格格局:	主格(A+S)	受格(P)
施格格局:	施格(A)	通格(S+P)
三分格局:		
中和格局:		

书中指出最常见的是两分的受格格局和施格格局,三分格局(用三个格)

的极少,中和格局就是没有格标志的语言,但是实际上总有其他手段(语序或动词一致等)进行语义角色的区分。施事性最强的 A 和受事性最强的 P 合用一个格标志情况极为少见,而且是语言转型过程中的不稳定过渡状态。这就反映了标志所表达的功能的连续性。标志连续性也是当代语言类型学中一个重要内容,在类型学文献中,使用了一个中国读者甚难理解的名称——“语义投影连续假设(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即“任何特定语言和(或)特定构式的范畴都映射概念空间中的一个相连区域”(Croft 2003:134)。

事实上,问题还稍微复杂一些。如 3.1 章说到 Tsova-Tush 语中不及物动词“跌倒”的施事要根据是主动地有意跌倒还是被动地无意跌倒,即根据“自控性”的强弱,采用不同的格形式。我国藏语中也有类似情况。如果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的话,由于功能连续性的限制,所能增加的格局只有下面一种(Кибрик 2001:187),这种格局被称为“主动格”(active case)格局。

(2)施事性强弱的连续统(从左到右施事性越来越弱)

及物动词的施事		不及物动词的		及物动词的受事 P	
		主动者		被动者	
A		Sa		Sp	
P					
主动格局:		(A+Sa)		(Sp+P)	

关于格标志使用的经济性,6.2.2 节还提到高生命度和高指别性的宾语更需要格标志,以及低生命度的施事更需要格标志。就是因为这些情况下容易发生施事、受事角色的混淆,因此格外需要格标志。关于这一点,后面第九编还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对格标志分布的分析,是功能解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语言学界曾有一种看法,认为汉语的一个特点是某些类似形态的东西具有可用可不用的灵活性,因此跟其他语言的形态不同。其实其他语言也无不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编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克服这方面的一些成见和偏见。

第七编讨论关系从句,其中 7.2.2 节提到的中心名词不是从关系从句中提取出来,而是添加一个标志,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关系从句的本质及其形式多样化,很有启发意义。

第八编讨论使成结构。使成结构大致相当于汉语的兼语式。汉语中兼任

宾语和主语的“兼语”成分,在形态格丰富的语言中,都不会是主格,而采用工具格、与格和宾格。因此,汉语语法的“兼语”这一带有折中色彩的术语实在应该取消。根据汉语的情况,应该看做宾语,即汉语的兼语式相当于英语中的使成式 SVOC(主语-动词-宾语-补语)。

其中 8.2 章对使成结构的讨论提出的格标志和自控度之间的跨语言等级(工具格>与格>宾格,181 页)非常有意思。其实,可控度等级跟格标志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使成结构中。例如在俄语中,可控度较小的“逻辑主语”,也往往采用与格标志,如下面例句中的 *мне* 是单数第一人称与格形式。

Мне надо хорошо учиться.

我(与格)应该 好好地 学习(不定式)

(我应该好好学习。)

Мне жароко.

我(第三格)热

(我(感到)热。)

Мне тридцать один год.

我(与格)三十 一 岁

(我三十一岁。)

以上这些“逻辑主语”,对于谓语状态并没有可控性。这对于理解“主语”概念的复杂性,也极富启发。

第九编的重点是 9.2 章。其余三章都是概念性的讨论,只有这章介绍生命度跟具体语法形式的关系,主要是跟形态的关系;总的倾向是生命度越高形态标志也越丰富。此外,这里没有强调而其实很重要的是生命度对语序的影响。如第六编的 6.2.1 节(129 页)就说到了某些语言中,生命度是决定语序的基本因素。本章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这点,但是例(1)和例(2)的比较,也间接反映了生命度跟语序的关系:如果受事的生命度高于施事,动词必须采用被动形式,而对于很多语言来说,所谓被动式都是受事前置于施事的格式,联系到生命度,就是受事因生命度高而前置于生命度低的施事。

第十编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10.3.2 节。我国语言学界曾以为汉语句子的语序跟构词的语序之间的一致性 is 汉语的重要特点,这一节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的倾向,因为词法由句法发展而来。我们需要注意的倒是

不一致的情况，书中提出了一些例外提请读者注意。书中提到的布里亚特蒙古语从人称代词发展来的主语一致是后缀，而其来源主语人称代词（其实往往是复指话题化主语的成分，相当于汉语中“张三，他去过这个地方”中的“他”）却是前置于动词的（218 页）。10.4 章中讨论的马耳他语的例子也说明了“主语”身份是多种性质的集合，对汉语的主语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具体启发。

第十一编讨论类型学跟其他关系较远的研究领域，如儿童语言习得、手势语、混合语等的关系，表明类型学的发展潜力。这一编也把全书的几个重点重新强调了一下，其中特别提到生命度对形态标志的影响的普遍模式和主语的某些来自话题的普遍特征，以此说明类型学跟功能解释的关系。此外，也说到语音结构的许多共性取决于人类声道的结构、语音的物理性质和人类听觉的性质，以此阐明功能主义的原理。

这一编在说到考察广泛语种的重要性时，提到研究最充分的、也是许多语言学理论赖以建立的语料基础的英语，实际上是印欧语系中一种很不典型的语言。其中提到英语动词一般现在时只有第三人称单数有显性标志-s，而几乎所有其他语言中，第三人称恰恰是最少显性标志的。我们可以提供两个具体的例子：匈牙利语动词的主语导向的一致形态和 Hua 语动词的附缀宾语。

	匈牙利语动词一致后缀	Hua 语代词宾语
第一人称	lát- ok （我看见）	d -ge （他看我）
第二人称	lát- sz （你看见）	k -ge （他看你）
第三人称	lát- ø （他看见）	ø -ge （他看他/她）

事实上，在阿拉伯语中，第一、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意思分别是 al-mutakal-limu“说者”、al-muhatābu“听者”和 al-ya’ibu“不在场者”。“不在场”的意义跟不存在的零形式正好对应，也符合语言象似动因。我国汉藏语系不少语言，动词一致关系往往在第一、第二人称方面比较严格，但是第三人称则不太严格，或者不体现一致关系。如果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这些情况跟英语比较，并且误认为英语中这一点反映了印欧语的一般情况，就会觉得我国那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人称标志特点跟印欧语不同。但如果扩大比较的范围，就会知道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感想与思考

我们由前面关于英语中动词单数第三人称反而有显性一致标志这一特殊性的例子,也可以想到,汉语在许多方面,也是很典型的 SVO 语言,表现出不少明显的 SOV 语言的特征。如大量使用后置词,状语和关系从句的前置。使用后置词并不很特殊,因为总体上后置词比前置词占有优势,根据语序相关性(4.2.2 节,也就是 Hawkins 1983 的所谓“跨范畴和谐”原理)应采用前置词的 VO 语言却也使用采用后置词的情况多得很,因为这种偏离是向优势参项偏离。但状态和关系从句的前置就可以说非常特殊了。Dryer & Gensler (2005)统计的 192 种语言中,状语前置的语言只有 3 种:汉语北方话、粤语和客家话,其实都是汉语。我们一时难以找到汉语中状语前置的确切功能动因。Dryer(2005)统计了 375 种 VO 语言,其中关系从句前置的只有 5 种:汉语北方话、粤语、客家话,中国大陆的白语和台湾的阿眉斯语,实际上只有三种:汉语、白语和阿眉斯语。而一般认为白语,部分地由于深受汉语影响,经历了从 SOV 到 SVO 语言的变化,其关系从句前置可以说是保留了 SOV 语言的特点的结果。汉语作为一种 VO 语言而关系从句前置这一点从理论上特别有意义。因为总体上后置关系从句相对于前置关系从句占优势,根据一般语序相关性,如果应该采用前置关系从句的 OV 语言偏偏采用后置关系从句,这并不算太特殊,实际例子也不少。但汉语这方面是朝劣势的前置关系从句偏离,那的确非常特殊,根据 Dryer (2005),同类例子也的确极为稀少。一个可能的功能解释就是汉语的宾语实际上很容易通过话题化、次话题化或“把”字宾语化而前移,构成实际上的 OV 格式,从而避免从句插入动-宾之间对建立动-宾间的语义联系产生干扰这一消极后果。

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我们以前研究汉语,主要是跟英语以及其他印欧语言比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许多以前被认为是汉语重要特点的,其实不那么重要,而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汉语表现,却可能是很重要的特点(如刘丹青 2002)。

当然,上述后两个特征的统计,中国境内许多语言明显缺位,例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其他方言。事实是中国境内许多 VO 少数民族语言跟汉语有上述的同样特点,当然不可否认其中不少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国际语言类型学对中国语言的缺乏了解和研究,表明中国的语言类型学调查和

研究,在为国际语言类型学提供缺失语料和纠正语料倾斜性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另一方面,由于汉语研究的某些特点,也使中国学者在类型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可以做出富有特色的贡献。例如,汉语语法中对语序研究特别多,而语序也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主要领域,汉语语序研究的某些成果,如语用对语序的影响等,应该能为语言类型学提供借鉴。又如,我们介绍第十编时说到,句子成分的顺序跟词内成分的顺序一致是人类语言的共同倾向,需要注意的倒是不一致的情况。据笔者观察,不一致的情况都是按句子语序推理应该前置的成分在词内却是后置性的(除非该语言的句子语序类型后来发生了变化,而词内语序因相对句子语序更保守稳定而没有变化)。这跟类型学中普遍注意到的作为功能标志的虚化成分的后置优势是一致的。至于虚化的成分为何倾向于后置,书中没有讨论,但是书中关于虚化是一种“去强调化”(de-emphasized)的说法,为我们理解虚化成分的后置倾向提供了一个解释。以往的研究表明(如 Hawkins & Cutler 1988),词首位置比词尾位置更容易处理,因此表达作为主要信息的词根适合在词首而表达作为次要信息的语法附缀适合在词尾。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去强调化往往伴随着语音的弱化,而弱化成分本身有后置倾向,因为“重—轻”节奏内部两成分结合更紧密,具有更大的“整体性”(柯航,2007:16)。这大概也是比起前置功能标志,后置功能标志跟其相关成分在节律上总是更紧密的缘故(试比较“如果||怎么怎么的话”中的停顿)。我国在语法—节律关系方面的一些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对附缀后置倾向做出更好的解释。

参考文献

- 柯 航 2007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搭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 刘丹青 2002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民族语文》(5):1—11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yer, Matthew S. 2005 Order of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In Haspelmath, Martin; Dryer, Matthew S; Gil, David; Comrie, Bernard (eds.) 2005: 330—333.
- Dryer, Matthew S. & Gensler, Orin D. 2005 Order of object, oblique, and verb. In Haspelmath, Martin; Dryer, Matthew S; Gil, David; Comrie, Bernard (eds.) 2005: 343—345.
- Haspelmath, Martin 2005a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the verb “give”. In: Martin

- Haspelmath & Matthew S. Dryer & David Gil & Bernard Comrie (eds.) 2005; 426 — 429.
- Haspelmath, Martin; Dryer, Matthew S; Gil, David; Comrie, Bernard (eds.) 2005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wkins, John. A. 1983. *Word Order Univers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wkins, John & Anne Cutler 1988. Psycholinguistic factors in morphological Asymmetry. In Hawkins, John (ed.) *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280 — 31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Newmeyer, Frederick. 2005 *Possible and Probable Languages: A Generative Perspective on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Кибрик, Александр Е. 2001.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им и прикладным вопросам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е, типовое и специфичное в языке). 2-е изд. Москва: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continuing demand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necessitates yet another reprinting. In earlier reprintings, I restricted changes to corrections of typographical and other minor errors and updating of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However, developments since 1980 (when I completed the manuscript of the first edition), both specifically in universals and typology and more generally in grammatical theory, have rendered a somewhat more substantial reworking of the text essential. The main changes are in chapter 1, where a now outdated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ata bases has been replaced by new material, and in chapter 11, which is substantially new. The other chapters remain more or less the same, though new material has been added to chapter 2; the main differences are clarifications of certain parts of the texts and a more substantial updating of the bibliography.

I am grateful to those who reviewed the first edition and to all those who have given me comments in various ways, not least among them my own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basic aim of the book remains, as in the first edition,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typology from an, albeit slightly modified, Greenbergian perspective. I have resisted the attempt to engage in protracted dialogue with proponents of other approaches or even to provide extension commentary on such other approaches, as this would be out of place in an introductory text of this kind. I have retained essentially the same coverage of topics, though it should be realized that my selection of topics to illustrate work on universals and typology is in large measure personal.

It is perhaps worth emphasiz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my outlook on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typology as represented in the body of this book.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provide us with a rich variety of data on the basis of which we can study the general properties of the human language potential. (The richness of this material should not blind us to its fragility; languages are dying out at an alarming rate, a fact which raises surprisingly little public concern, even among those who do express alarm at the destruction of other parts of our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human linguistic potential, we must develop methods, descriptions, and analyses that are not only sufficiently constrained to say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those properties that are common to all languages but also sufficiently flexible to permit insightfu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egree of variation that we find among languages.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should be driven primarily by the varied data that languages present to us; while any comparison, or indeed any description,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abstractness of representation, reliance on overly abstract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 description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what will be compared are not languages but linguists' conceptions (or misconceptions) of languages. This does not imply an atheoretical stance, though it does imply an attitude that is at least cautious to some of the claims of currently dominant grammatical theories. Linguists working on universals and ty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advocated here are obliged to seek explanations for the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hey establish; adoption a priori of a particular explanation (especially a largely untestable one such as innateness) serves only to blind the linguist to the possibility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The approach that I present in this book is thus part of an attempt to provide an explanatory account of the nature of human language.

Los Angeles, August 1988

Bernard Comrie